

# 延安时期党纪教育的成效与启示

□ 余 湘 王亚妮

延安时期是党的纪律建设系统推进、党纪教育全面展开时期，对我们今天学纪、知纪、明纪、守纪，用党规党纪校正思想和行动，增强纪律意识，提高党性修养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 政治纪律是延安时期党纪教育的主线

政治纪律教育是党纪教育的“纲”，是贯穿延安时期纪律建设、党纪教育始终的一条主线，其首要任务是教育全党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针对张国焘另立“中央”，破坏党的团结统一的分裂行为，以及王明在组织上闹独立性、不服从中央、破坏中央权威等严重破坏纪律的行为，1938年10月14日，毛泽东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强调，“必须对党员进行有关党的纪律的教育，即使一般党员能遵守纪律，又使一般党员能监督党的领袖人物也一起遵守纪律”。11月6日，全会制定并通过了《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和《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以党内法规的形式明确了党中央是全党的最高领导，并且强调了从言论、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政治原则。

刘少奇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建议全会把三个决定“发出教育全党同志，为党的建设的一课”。党中央通过在全党、全军开展批判张国焘错误路线运动以及整风运动和党史学习教育，最终纠正了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错误和王明的“左”、右倾错误，不仅使全党全军有效维护了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而且在党的七大上实现了毛泽东提出的“向中央基准看齐”，达到了“两个空前”：全党空前一致地认识了毛泽东同志路线的正确性，空前自觉地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了。

## 组织纪律是延安时期党纪教育的核心

组织纪律教育是党纪教育的“根”，是延安时期纪律建设、党纪教育的核心，重点是反对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和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做到“四个服从”。当时，针对

党内存在政治上自由行动，组织上自成系统、自成局面，思想意识上的个人主义等违反党性的倾向，毛泽东在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首次提出“四个服从”。

1941年7月1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要求全党党员，尤其是干部党员不断增强党性锻炼，严格遵守“四个服从”的基本原则，反对分散主义、独立主义、个人主义，使党更进一步地成为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的党。

1942年，中央组织部选派十多名干部赴敌占区工作，有7人以各种理由推诿拖延，拒绝服从组织决定。为了增强党员干部党性，强化服从组织决定的纪律观念，9月，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撰写了《延安新干部党性薄弱现象及如何增强其党性问题》一文，指出要通过加强党性教育和纪律教育来增强党员干部的党性，特别强调绝不允许和组织决定讲价钱。10月19日，中央党务委员会决定对公开拒绝分配的7名党员给予纪律处分，同时对勇于接受工作的9位同志予以奖励。

此外，刘少奇、任弼时等党的领导人还多次通过写文章、作报告、讲党课，教育党员、学员要严格遵守党的纪律，把服从党的利益，遵守党的纪律，服从党的组织，百折不挠地执行党的决议作为“共产党员的标准”和“测量党员党性”的主要内容。

1945年5月，刘少奇《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指出，党章规定的“四个服从”原则必须无条件地执行，不能以能力之强弱、地位之高低、党龄之长短、文化程度之高低作为服从的条件。从党的七大开始，“四个服从”被写进党章。1982年党的十二大通过的党章对“四个服从”作了新的表述，沿用至今。

## 廉洁纪律是延安时期党纪教育的防线

延安时期，为了严肃地坚决地保持共产党员的纯洁性，防止滋生腐败现象，党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十分重视廉洁纪律教育，多管齐下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

一是教育导廉。延安时期坚持理论教育与实践教育相结合、集中教育与日常教育相结合、案例警示教育与模范榜样教育相结合，提高了党员干部追求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内在自觉。

二是惩腐促廉。坚决惩处腐

败，以惩促教，是延安时期廉洁纪律教育最有效的手段。1942年11月，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上讲解斯大林《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指出“党必须经常改善自己的社会成分，消除那些腐化党的机会主义分子”。如肖玉璧作为老红军，战功赫赫，身上有90多处伤疤。但是，他在担任靖边县张家畔税务分局局长期间贪污公款、倒卖物资，被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判处死刑，起到了极大的震慑和警示教育作用。《解放日报》发布消息和评论，指出“在‘廉洁政治’的地面上，不容许有一个‘肖玉璧’式的莠草生长！有了，就拔掉它！”

三是领袖示廉。党的领袖群体以身作则的廉政为民形象对延安时期的廉洁纪律教育起到了巨大的示范和带动作用。毛泽东在延安杨家岭亲手开荒种菜，周恩来、任弼时被评为纺线能手，朱德背上粪筐拾粪积肥。中央领导和普通士兵一样，吃的是小米饭，穿的是粗布衣，住的是土窑洞……党的领袖群体严于律己、清正为民的形象动员感召着广大党员干部始终保持共产党员的政治本色。

四是制度保廉。1941年5月1日，经毛泽东加写和改写、中央政治局批准发布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规定“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强调“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施政纲领不仅适用于陕甘宁边区，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均可施行，纲领的施行使边区政府成为了“十个没有”和“只见公仆不见官”的廉洁勤俭政治模范区。通过筑牢思想防线、严惩腐败分子、建立健全法制等措施，延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历史上矗立起了一座廉洁政治的丰碑。

## 群众纪律是延安时期党纪教育的重点

群众纪律教育是党纪教育的“魂”，是延安时期纪律建设、党纪教育的重中之重，核心是践行党的性质宗旨，确保群众路线的贯彻执行，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一是教育军队严明纪律、秋毫无犯。毛泽东通过作报告、发电报、作指示等多种形式，对军队进行群众纪律教育。他指出，军队不要忘本，本就是工农。要充分注意群众工作，仔细地建立与群众的关系，要同群众打成一片，忠实地为人民服务。任何部队，在每一次行

动前，必须进行一次的公开的集体的纪律教育。如1937年10月30日，毛泽东致电王兆相等并告八路军总部、第一二〇师：“十分注意部队的纪律，无论如何困难，不得乱拿工农一草一木，每天出发训话一次。”

二是教育党员干部牢固树立群众观点，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群众是我们最后的依靠，也是抗战的最后依靠。我们党没有人民，便等于鱼没有水，便没有生存的必要条件。1939年11月1日，毛泽东在讨论《中央关于深入群众工作的决定》草案时，指出脱离群众是一种罪恶，要进一步地依靠群众，把群众工作好坏作为判断党的工作好坏的主要条件。西北革命根据地创始人之一的习仲勋，长期关心群众生活，在群众中享有很高威望。1944年11月5日，《解放日报》刊载了习仲勋在绥德分区司法会议上的讲话《贯彻司法工作的正确方向》，在第一部分“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这一方面”中，要求“一心一意老老实实把屁股放在老百姓这一方面，坐得端端的”。

三是教育全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1944年9月8日，毛泽东出席普通战士张思德的追悼会并发表了著名的《为人民服务》，强调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利益工作的。从党的七大开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个党的根本宗旨以及群众路线这个党的根本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被写入党章，一直沿用至今。

总之，延安时期的党纪教育，使全党统一了思想、纯洁了组织、联系了群众、凝聚了力量，实现了“三多三少”：讲个人要求的少了，服从组织分配的多了；图安逸比享受的人少了，要求到前线 and 艰苦地方锻炼的人多了；自由主义现象少了，严守纪律的人多了。

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总结党成立以来28年的革命经验指出，“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

（摘自2024年5月13日《北京日报》，原标题为《党纪教育的纲、根、魂》）



## 唤起工农同心干

□ 杨特团 刘慧君

“发展闽西苏区”“白军士兵是工农出身不要拿枪打工农”“欢迎白军来当红军”……在福建省漳州市南靖县金山镇水湖街有一座始建于清末的敦庆楼，外墙上还保留着多处90多年前中国工农红军书写的宣传标语。这些标语，揭开了一段烽火岁月，展现了当年红军进漳的工作场景。

为了粉碎敌人经济封锁、向外发展，1932年，中国工农红军东路军从江西瑞金出发，翻过武夷山、跨过汀江，从龙岩一路南下，于当年4月20日一举攻克漳州。

4月21日，东路军总部在漳州芝山南麓的红楼召开了师长、师政委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同志主持会议。会上制定了各部队分驻各地，深入发动群众，完成政治、军事、经济任务的行动计划。按照总部的指示，红十五军所辖的三个师深入南靖发动群众。

南靖虽紧邻闽西苏区，可由于之前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广大群众并不真正了解红军，对红军还存在误会、猜疑和顾虑。当红军进驻南靖时，地主豪绅逃跑了，一些普通商人和老百姓也跟着躲进山里，以致出现商店关门，圩日停赴，人心浮动，生产停顿的现象。

面对这一情况，红十五军政治部立即组织广大指战员深入南靖各地，广泛开展宣传发动工作。

组织小分队。红军各连队普遍组织起三人一组、五人一队的宣传小分队，深入到城镇、乡村去宣传。他们分散到贫苦群众家里去走门串户，与老乡促膝谈心，说形势、讲政策，澄清老百姓的模糊认识，拆穿敌人骗局，使广大群众对我党的政策、红军的宗旨，逐步有了正确的认识。

搭起演说台。各部队在人口

集中的地方，如城关城镇、靖城、和溪等搭起演说台，趁着圩日群众赶集的时候，上台讲演，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揭露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罪行。

书写大标语。红军所及之处，普遍采用书写标语、绘漫画、编歌谣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揭露国民党军阀罪恶行径，宣传共产党革命主张。

借助这些生动有趣、通俗易懂又便于传播的宣传形式，一个多月时间，红军已巧妙地把党的主张、红军的性质、进漳的目的等传遍南靖。躲进山里或者逃往外乡的群众，不久便陆续归来。不仅如此，在耳濡目染红军纪律严明、买卖公平等优良作风后，广大群众更加确信了红军是工农自己的队伍，纷纷积极配合红军打击土豪民团、筹粮筹款、扩大红军队伍。据不完全统计，从当

年4月底到5月中旬，红十五军仅在南靖山城区就筹款近8万元，并筹集到大批粮食、食盐、药品、布匹等物资；短短一个月时间，全县有200多名青年参加红军。

1932年5月28日，中国工农红军东路军在胜利完成东征漳州各项任务后，撤离漳州，回师中央苏区。由于形势紧张，敦庆楼卢姓楼主将这些写于墙壁上的革命标语抹上白石灰，顺利躲过了敌人的破坏。

新中国成立后，南靖县有关部门曾就散落于全县的红军标语展开多轮寻访和保护。上世纪90年代，在敦庆楼老居民的指引下，方志委干部铲掉白灰，这些革命标语终于重见天日，成为那段革命岁月的见证。

（摘自2024年5月10日《中国纪检监察报》）

1927年9月，毛泽东作为中共中央特派员被派往湖南，与湖南省委一起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在此期间，毛泽东敏锐觉察到官兵普遍存在文化程度低、军事技术差等问题。10月，起义部队转移至井冈山后，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加剧，加之战事频繁，无论干部还是士兵都亟待加强军事训练，以提高军事素质和作战能力。当年11月底，毛泽东在江西宁冈砵市的龙江书院，创办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第1团军官教导队（以下简称“井冈山教导队”）。

井冈山教导队是我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后开办的第一所军事教育机构。毛泽东十分重视井冈山教导队建设，亲自选拔干部，挑选军事素养较强的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生、第一团军官队长吕赤任教导队队长；调整钟任党代表兼党支部书记。毛泽东还为井冈山教导队规定了三项任务：一是为部队和地方培养输送干部，二是改造俘虏，三是调查研究敌军情况。教导队实行严格的“三操二讲一点名”作息制度，学习内容包括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

授课深入浅出，鼓舞官兵斗志。井冈山教导队开办后，毛泽东经常为学员讲授政治课。毛泽东的讲课深入浅出，循循善诱，从大家最熟悉的事物讲起，谈笑风生、拨人心弦，给人以启发和鼓舞。一次课堂上，毛泽东以舂米为例，生动形象地讲解什么叫做“革命”。他说，从一个人拿棍子舂米，到用水车舂米，再到用机器碾米，这就是进步，这就是革命。他说：“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什么？革命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把所有用人的生产，变成用机器生产。要达到这个目的靠谁呢？要靠群众自己。那么，群众怎么知道革命的道理呢？那就要靠我们共产党员去讲，所以，你们要到哪个地方，都要注意学习这个问题，红军就是个大学校。”

还有一次，毛泽东发现学员谢华光因练习刺杀不得要领，而被教官训斥。问清缘由后，毛泽东突然指着前方对谢华光大声喝道：“你看，恶霸带着乡丁到你家捉拿你母亲来了，还不快刺他！”谢华光听后，昔日家中悲惨的画面浮现眼前，顿时怒上心头，端起枪向前猛刺，又狠又稳又准。一旁观看的教官和学员，无不连声喝彩。毛泽东说：“练刺杀，要把阶级仇恨带进去，这就叫‘有的放矢’！”这件事迅速传遍井冈山各部队，极大鼓舞了官兵的革命斗志。谢华光毕业后回到家乡古城担任赤卫队队长，带领赤卫队打土豪、分田地，并在新城、潭田战斗中有力配合主力部队作战，成功掩护大部队安全转移。

三项训练内容，紧密结合实战。井冈山教导队的军事训练，也在毛泽东的直接指导下改进完善。1927年12月，毛泽东发现教导队军事训练只有队列、射击和投弹等单兵课目，且与实战结合不够紧密。于是，他帮助教导队总结经验，要求教导队加强战术训练和夜间训练，具体规定了三项训练内容。

第一项：“十八字战术”，即“利用地形地物，发扬火力，消灭敌人，保存自己”。具体就是利用有利的地理条件隐藏自己，紧盯敌人行动，瞄准敌人开枪，增加敌人伤亡、减少我方无谓牺牲。第二项：“十二字游击战术”，即“敌来我去，敌驻我扰，敌退我追”。敌来我去，不是消极逃跑，而是有计划地撤退，在撤退中找准有利时机杀伤敌人，打乱和迟滞敌行动，削弱敌优势；敌驻我扰，就是扰乱驻守之敌，军民联合采取多种方法手段，潜入敌营地，侦察敌情，破坏敌军军事设施，搅得他们昼夜不安、疲劳不堪，伺机消灭；敌退我追，就是要乘胜追击退却之敌，重点打击对手的伙夫担子，俘虏敌伤员，缴获敌枪支弹药，让敌军撤得不痛快不利索。第三项：加强夜间训练。学会走夜路，特别是夜间走山路。尖兵班和排长要注意掌握各条道路各个方向的敌情，前进中发现敌情要立即查明情况，及时上报连长处理。同时，要学会夜间摸敌哨，夜间观察目标、传达口令和命令。在充实游击战术、夜间训练课目基础上，教导队还增加了野外实地演练的

# 井冈山教导队——开创我军院校教育先河

□ 钱 锋 廖和春 曾庆友



课时。

分兵发动群众，集中英勇杀敌。井冈山教导队既是训练队，也是工作队和战斗队。在毛泽东的带领下，学员们分头深入古城、茅坪、新城等地做群众工作，调查农村阶级和土地占有情况，了解贫苦农民的状况和心声，在实践中掌握宣传、发动和组织群众的工作方法。井冈山教导队经常跟随部队实施战斗行动。1928年2月，井冈山教导队跟随部队参加新城战斗。新城，西连砵市，南通茅坪，北扼宁冈至永新的通道。毛泽东决定集中优势兵力，围攻新城守敌。井冈山教导队负责攻打北门。战斗打响后，教导队学员奋力阻击，打退企图从北门逃跑之敌，随后攻破北门杀入城内，配合第一团主力将守敌逼退至西门外第二团伏击圈，为新城战斗胜利作出突出贡献。

1928年4月，朱德率领南昌起义军余部及湘南工农军转移至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原工农革命军第1师第1团改称第11师第31团，其军官教导队改称第31团军官教导队。由于斗争形势紧张，井冈山教导队仅开办了一期。经过井冈山教导队半年多的培养，150余名学员茁壮成长，为井冈山红色政权的创建输送了一支富有斗争本领的干部队伍。他们中有的学员后来成长为优秀的军政指挥员，如谭震林、贺敏学、谭甫仁等；有的学员毕业后回到地方工作，深受当地群众敬重，起到了工农武装革命“种子”作用，如谢华光、刘仁堪、蔡德华等；还有不少学员为革命英勇捐躯，如吕赤、王良等。

井冈山的办学实践，在我党我军教育史上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是毛泽东军事教育思想的生动体现和深刻诠释。同时，也为我军后来创办各类军事训练班及军事院校提供了宝贵经验。

（摘自2022年8月4日《中国国防报》）



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第1团军官教导队旧址——龙江书院